

邮票上的浙江

► 集邮访谈

对话杨建新：

要重新认识集邮活动的文化价值

记者：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邮票的文化价值。

杨建新：邮票虽然小不过方寸，但是意义重大。过去我们讲邮票有两大功能：一个是邮资凭证、一个是国家名片。随着邮资凭证功能的慢慢弱化，它的国家名片的属性、文化属性更加突出。我认为更确切地说邮票的本质属性就是一个文化商品，其本身就是文化的一部分。具体来说：

第一，集邮活动本身就是个文化活动，功能非常多元，内容非常丰富，这样的活动多多益善。

第二，邮票包含的内涵极为丰富，历史、地理、生物、艺术、社会、人文……大千世界无所不包，加上设计精美富有创意，印制独特精湛。无论是它的表现样式、呈现方式以及内涵都极具价值，所以我把它定义为以国家行为为依托的最富价值的文创产品。

第三，邮票被称为国家名片，由国家出面发行，是最具权威的宣传品。对内可以鼓舞士气凝聚精神，对外可以扩大影响，激发人们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精神和情怀。

最后，邮票可作为极具收藏价值的艺术品；邮票收藏的过程、鉴赏的过程，也陶冶了性情、增长了知识、扩大了视野，一举多得。

记者：请问邮票在非遗保护工作中起了什么作用？

杨建新：我特地去查证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发行的邮票大概有108套（枚）跟浙江有关，而这108套（枚）里面有31套（枚）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有关。

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是2003年起步的，由浙江省为试点开路。中国现在共有人类非遗项目46个，世界第一，浙江占10个（包括与浙江有关联的）；我国有国家级非遗保护项目1500多个，浙江占241个；2003年至今，我国一共评选了五批的国家级非遗项目（第六批评选结果尚未公布），每一轮浙江都名列第一。目前浙江省的省级非遗名录是886个。

我们的邮票文化工作者们，是有先见之明的——所有涉及浙江非遗的邮票邮品的出版发行，时

人物名片：杨建新

省非遗保护专家、集邮爱好者
曾任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台办主任、省文化厅厅长；现任省人民政府参事、省邮票选题咨询委员会专家



间都早于申报时间。很多非遗项目在老百姓那里口口相传，也是得益于邮票。不少老百姓都这样说，“这个是邮票上印过的”，或者说在邮票上看到过的。在他们心目中，只要是邮票上出现过的，就是重要的，有分量的。比如青田石雕，4个大师4件作品被印上了邮票，全国人民都知道了青田石雕。现在好多工匠人自己要出个性化邮票，就是因为上了邮票，就代表了权威，代表了影响力，代表了重要性，代表了有分量有文化。所以邮票在扩大非遗保护的影响力、提升广大群众的保护意识、促进保护工作上功不可没。

记者：邮票背后的精神是什么？它有什么教育传播价值？

杨建新：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这些文明成果是中国人的也是全人类的，中华民族为人类

做贡献，我们也要向全世界学习人类精神文明的成果，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优秀传统文化熏陶最好的教材，而这些内容早就被印上了邮票。所以我有一个想法，特别是面对现在集邮活动比较低迷这个状态，我很想呼吁要重新认识、重新评估集邮活动的重要价值！尤其在校园里要提倡开展集邮活动，邮票应该成为课堂教学的重要伙伴和辅助材料，同时可以作为孩子们课余活动的有益内容。我如果是一名小学老师，我会在教学中把邮票拿来作为课本的辅助教材，有文字有画面，既形象又生动，还便于携带。

记者：您对开展青少年集邮有何期望？

杨建新：我们现在很强调文化的传承、文化的自信，青少年是不是接受、认可、热爱、参与，是很重要的一个标志。集邮活动也是这样。既然它是有益身心的、有益提升国民素质的一项健康积极的文化活动，那我们就要大力倡导宣传，要让更多的青少年来认识、来参与。

从我个人经历来讲，我是觉得集邮不仅是一个简单的丰富业余生活的活动，也不仅是纯粹从经济价值考虑的艺术品收藏活动，它确实从知识的拓展、素养的提升、性情的陶冶等多方面来讲对年轻人有好处。当然现在这样的东西也很多，使得年轻人有很大的选择空间，但是我还是觉得集邮是一个非常简便易行的、值得提倡的活动。现在中小学生的活动很丰富，比如书法美术活动、手工技艺活动等都很丰富，但是都不如集邮来得简便易行。邮票太简单了，一年邮票20多套，一本小册子，拿个放大镜反复揣摩、反复欣赏，从中获取知识，愉悦心情，尤其是日积月累，收获就更大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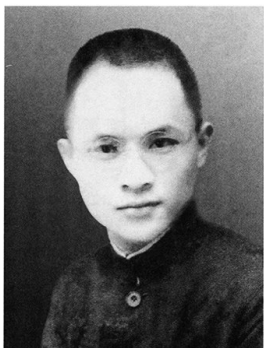
□记者 陈惠 周倩 徐君



本文为访谈节选
详细内容请扫二维码

► 邮票故事

86年前，这个青年发现了良渚古城



这是施昕更在瑞安所摄肖像，他曾将此照片赠予同事钟国仪。1938年，施昕更在瑞安重新完成良渚考古报告，钟国仪受托来瑞安取走手稿，冒着危险送至上海印刷出版。

2019年7月6日下午，阿塞拜疆申遗现场，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现场，掌声此起彼伏。这一年，一个名字被无数次提起，这个名字是施昕更，他是良渚文化的最初发现者和发掘者。

1912年农历六月二十，施昕更出生于杭县（今余杭）良渚镇一个破落困窘的小商人家庭。施家祖上也曾做过官，但到施昕更父亲这一代，已是没落。施昕更从小聪颖，很受老师喜爱。小学毕业后他考入杭州第一中学，家人高兴之余却又犯难：学费哪里来？好心的老师给施昕更送来一笔钱，对他说：你将来要为良渚这个地方服务啊，更要为中国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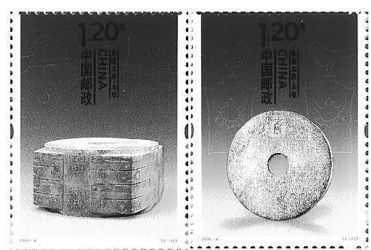
读完中学后，他被老师举荐到西湖博览会作讲解员；博览会改为博物馆后，他任博物馆地质矿产组

绘图员。1936年5月31日，他在参加古荡考古发掘时，面对出土的一种长方形有圆孔的石斧，想起在老家良渚曾见过这种东西。第二天，他迫不及待回到良渚，果然搜集到许多不同形式的石器。

7月间，他再回良渚，在一个枯涸的塘边，捡到几件石器，同时发现许多散布的陶片及陶鼎足，他感到莫大鼓舞。11月初第三次摸底时，在良渚的棋盘坟，他捡到了一两片黑色有光的陶片。他参考了各种考古材料，特别受《城子崖》发掘报告启示，觉得捡到的陶片与山东龙山城子崖出土的黑陶相似。而这一两片黑陶，就是著名的良渚黑陶。

西湖博物馆肯定了施昕更的新发现，报经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批准，在良渚进行田野发掘。从12月至次年3月，由施昕更负责，田野发掘工作分3次进行。“我对于这遗址的研究，更加迫切，乃不揣谫陋，毅然负责作三次小规模发掘工作，得到意外的收获，在江南考古工作上也是一件值得纪念的事吧！”这是施昕更的心迹。

施昕更一边发掘整理，一边查找资料，到1937年4月，已经写就5万余字的考古报告，绘制图片100余张，定名《良渚》，副题《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交付印刷。但卢沟桥的炮声，让时局急转直下。此后，博物馆西迁，杭城沦陷……施昕更的心血之作，直至1938年才在“孤岛”上海问世。这部报告，以及施昕更的开创性工作，奠定了他“良渚遗址的发现者”和“良渚文化的发现人”的学术地位。



中国邮政2011年3月8日发行《良渚玉器》特种邮票1套2枚

“此书既成，反不忍卒读，更感慨万端！遥想这本书的诞生地——良渚——已为敌人的狂焰所毁灭，大好河山，为敌骑残踏而黯然变色，这报告中的材料，也已散失殆尽。”《良渚·卷首语》中，施昕更悲愤写道：“我们上古的祖先，坚韧的开辟了这广漠的土地，创下了彪炳千秋的文化”“中国绝对不是其他民族可以征服了的，历史明确告诉我们，正因为有渊源悠久、博大坚强的文化，所以我们生存在这艰巨伟大的时代，更要以最大的努力来维护来保存我国固有的文化，不使毁损厘毫，才可使每一个人都有了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心！”赤子之心，可见一斑。

抗战全面爆发后，施昕更投笔从戎，被博物馆馆长董聿茂推荐到瑞安抗日自卫会任秘书，宣传抗日。因积劳成疾，缺血短药，1939年5月29日，他在瑞安县立医院病逝，年仅28岁。两三年后，妻子也离开了人世。

施昕更有三个孩子，分别叫忆良、建良、建安，寓意纪念良渚、建设良渚、建设安溪（岳父母家乡）。三兄弟只有忆良活了下来，忆良的儿子时英，继承了爷爷的遗志，继续从事着良渚文化遗址保护工作。

□徐君